



□赵鹏飞

会馆起源较早，汉代的长安和洛阳城里已有外地同郡人的邸舍。南宋的杭州也有外地人联合组织的社会团体，不过规模和数量都有限，当时的称谓也不叫“会馆”。据史料记载，最早会馆出现在明永乐朝的北京。作为明清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又是大运河的首善之地，北京五方杂处，万商云集，成为会馆最早出现的地区。此后，会馆建造之风逐渐盛行，明中期至清末的数百年里，会馆建筑纷起频出，遍布全国各地。

会馆主要分为三类：士绅会馆、科举会馆和商业会馆。士绅会馆是明清会馆的最初形式，主要由寓居京城的官员捐建或倡建。科举会馆又称“试馆”，主要存在于举行乡试的省会城市和举行会试及殿试的北京，是以接待举子们考试为主的会馆。商业会馆即是商人兴建的会馆，它们分布最广，数量最大。明清时期长距离的商品贩运兴盛，京杭大运河的贯通给这种长途贸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于是各地商帮纷纷在运河沿岸建立商业会馆，这些因运河而兴的会馆成为明清时期运河商业文化的载体和见证。

山东运河商业会馆的分布

大运河沿岸城市都分布着数量庞大的商业会馆。北京“货行会馆之多，不啻什倍于天下各外省”，清光绪时各省在京会馆已达500多家；天津是因大运河而兴起的移民城市，清康熙《天津卫志》卷二《利弊》载“比闾而居者，率多流寓之人”，城内有闽粤会馆、江西会馆、山西会馆、济宁会馆、怀庆会馆、江苏会馆等等；此外，明清的苏州、扬州皆是万商云集，会馆密布。

山东运河处于京杭大运河的中段，水运交通网络发达，沿线城镇工商繁荣，商贾云集，四方辐辏，这一区域同样成为会馆林立之地。从山东运河北端的德州到南端的台儿庄，可考证的商业会馆有36所，另外还有12处的公所、庙、官也具有会馆功能。

从建造年代上看，明至清初的会馆大都以公所、庙、官的形式出现，说明这一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会馆”之名还未普及，而到了清代会馆之称已经相当普遍，这与全国商业会馆的发展步调是一致的。从会馆数量上看，晋商所建会馆占到了一半以上，其次是江南、江右以及闽商的会馆，这反映了全国各地商帮在山东运河区域实力的强弱。明代是徽商在山东运河区域发展的鼎盛时期，入清后徽商逐渐式微，故留下的会馆遗迹较少。清代晋商势力强大，基本控制了中国北方市场，在山东运河区域，无论是繁华城镇还是偏僻乡村，都有山西商人的行踪，他们到处开设店铺，出现了晋商独执牛耳的局面。原来被徽商抢占先机的济宁、临清等运河城市，清中期后晋商的势力逐渐占据上风。江南、江右以及闽商的会馆多集中在济宁、台儿庄和聊城，尤其以更靠近南方的济宁和台儿庄最为密集。



聊城山陕会馆(冯春玲摄)

从会馆分布上看，济宁的商业会馆最多，其次是聊城，再次是临清、张秋、阿城，这与山东运河城镇的规模和等级是相符的。外出经商的商贾，首先会选择社会、经济环境最优的府、州、县城作为商业基地，以保障商业活动的安全。以聊城和临清为例，尽管聊城当时的经济地位不如临清，但是作为府治所在地，既城池坚固，又交通便利，故许多客商选择在此地兴建会馆。另外，明中期是临清商业鼎盛期，当时兴建会馆之风还未完全流行，清代临清经济地位下降，而聊城商业后来居上，聚贾能力超过临清，因而会馆数量也多于临清。

聊城山陕会馆的建筑艺术特色

聊城山陕会馆位于古运河西岸，东关街南段，是清中后期山西、陕西商人驻足、议事、贮货、祀神、娱乐、举善的场所，也是山东运河区域唯一保存完好的商业会馆。

据现存山陕会馆内碑刻《重修山陕会馆戏台、山门、钟鼓楼记》载，山陕会馆的山门始建于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优人不戒于火，延烧戏台、山门及钟鼓二亭”，于四年后集资重修，即为今日山门、戏台、钟鼓楼。山门是整组建筑轴线序列的起点，为八柱牌坊式门楼，面阔三间，

进深一间，两侧带有八字照壁墙。明间正楼高起，屋顶为歇山式，上覆五彩琉璃瓦，下部以四根方木柱和四根圆木柱承重，外墙方木柱下的柱础为造型活泼的石雕狮子和麒麟。山门明楼檐下为十三踩如意斗拱，次楼檐下为十一踩如意斗拱，以致檐口出挑深远，檐角起翘较高，使整座建筑巍峨壮观。坊下辟一正门和两侧门，均为木质朱门。石作门框上雕刻麒麟、凤凰以及彩云飞鹤等，门面上均镶嵌圆钉和铁环。正门之上有石质匾额，楷书阳刻“山陕会馆”，笔格刚劲，刻工精湛。额枋上饰木刻透雕，内容为吉兽大象、狮子等，“无木不雕，无石不刻”的建筑艺术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整座山门气势雄伟秀美，工艺精巧华丽，是会馆单体建筑中的上乘之作。

大殿由献殿和复殿前后结合而成，是山陕会馆的中心建筑。献殿和复殿又各分为中间的正殿和南北配殿，面阔均为三开间，正殿为悬山顶，上覆绿色琉璃瓦，南北配殿各覆灰筒瓦。献殿又称“拜殿”，是商贾们集会议事、祭祀关公的活动场地，卷棚顶，装饰华丽。殿前有方形石柱四根，石柱下为石雕柱础，正面刻有颂赞关羽的楹联。楹柱上方镶有三块木质透雕额枋，分别刻有老子和八仙人物。关帝大殿檐廊正中，悬有木质阳文匾额“大义参天”四字。大殿中后部供有山陕商人的精神领袖——关羽以及关平、周仓三座塑像。南配殿称文昌火神殿，形制同大殿，是祭祀文昌火神的地方。北配殿位于正殿的北面，与南配殿位置相对应，也称“财神殿”，是商贾们祈祷发财的地方，建筑形制和装饰与南配殿相同。

在山陕会馆建筑群的各种装饰雕刻中，木雕所占比例最大，内容最丰富，艺术价值也最高。在建筑单体的梁柱、檐角、额枋、门窗、天棚、隔断等建筑构件上，木雕都有分布，题材除了少量的抽象装饰图案之外，更多表现当时民俗中喜闻乐见的人物和事物。其内容主要分为三种：一是以象征、寓意的手法表达美好意愿的吉祥图案，如“平安如意”“龙凤呈祥”“松鹤延年”“福禄寿喜”等；二是神话传说、寓言故事、戏曲人物、古代英雄以及小说演义等；三是直接表现现实生活题材和人们所熟悉的瑞兽等。木雕形式也多种多样，深雕、浅雕、透雕、圆雕都有，不同的雕刻手法因材施艺，彼此进行组合，形成丰满的多层次的立体效果。

刊于会馆单体建筑前的楹联书体正楷行书皆有，刻工阳刻阴篆兼备，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对仗工整，用意深刻，反映了山陕商人的价值取向，也是研究明清时期聊城经济的重要资料。

运河商业文化的表达

所谓商业文化，是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体现商业价值观念的文化现象，商业文化有着深厚的内涵，包括商业制度、商业精神等众多方面。运河商业文化即是指借助运河或在运河区域进行商业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现象。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重农抑商”一直作为历代封建政府所奉行的政策。明清时期经济繁荣，尤其是运河沿岸城镇客商云集，交易兴盛，这种南北大规模的物资交流、交换，潜移默化地催生新鲜思维、思想的诞生，改变着人们的固有观念，从而派生出运河商业文化。运河商业文化的突出特点是“信”和“义”，即以信取利，先义后利，关公的“诚信守义”的美德迎合了这种情况。因此在山东运河区域的很多商业会馆都供奉关公，以标榜商贾们“重信义、轻钱财”的经营理念。

另外，对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商贾们也极力进行宣扬。《琵琶行》就有“商人重利轻别离”的诗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职业需要造成的。商人也有常人的情感，他们常年在外地经商，对亲人的思念和不能孝养亲老的愧疚经常纠结于心。聊城山陕会馆大殿的额枋木雕，节选了中国古代著名的“二十四孝”中的一些故事作为雕刻内容，是儒家孝悌观念的形象体现。

山陕会馆的匾额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不仅从视觉效果上讲求材质的精良，漆工的精湛以及书法的精妙，除此之外，更多具有的是含蓄隽永的深层次内涵。山陕会馆的很多匾额内容反映了当时人们必须恪守的封建伦理和道德规范，并起到了训诫和宣传作用，如“大义参天”“风时浪恬”匾即是这种类型。有的匾额则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儒道互补精神，如山门上的“协天大帝”匾蕴含了人际和谐、天人和谐的哲学理念。还有的匾额巧妙地以儒家经典来展示山陕商人的经商理念和价值取向，如会馆山门右便门的石质阳刻匾为“履中”，左便门为“蹈和”，山陕商人以这四个字作为经商信条，“中”与“和”出自四书的《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之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儒家的经典学说中，“中”与“和”无所不统，无所不通，是人们为人、做事的根本。经商者也应当以此作为处世为人的最高原则，“履中”是警示商人要行为中正，不能偏激，否则就会失去商机，“蹈和”则是提醒商人经营要以和为贵，和气才能生财，其道理深入浅出，既反映出人们的思想信仰，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商人们的处世哲学和求财心理。

（摘自《大运河线性物质文化遗产——山东运河传统建筑》，赵鹏飞 谭立峰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故地往事】

蒲松龄给长申地写碑文

□于夫

蒲松龄，字留仙，山东淄川蒲家庄人。他的《聊斋志异》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鲁迅先生说，《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眼前；又或易调至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

章丘与淄川是邻地，蒲松龄一生多次赴济南应试，都要来往于章丘这片土地。他在章丘也有许多文朋诗友，经常游玩于章丘的山水之间。在其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章丘元素。如《聊斋志异》中的“查牙山洞”文中就是这样描写的：“章丘查牙山，有石窟如井，深数尺许，北壁有门，伏而引领望见之……”蒲松龄还有多篇颂扬明水、女郎山、白云湖等章丘山水的诗篇，也都是上乘之作，字字珠玑。所以，蒲松龄的一生，也与章丘结下了不解之缘。

长申地是章丘东南山区的一个小庄，明初建村，因其耕地狭长而得名，其位置是章丘与淄川的一个“边界村”。距离拉近了这个小村与聊斋故事和蒲松龄的关系。因村小无祭祀之地，村人便创建了一座“五圣祠”。建庙就要立碑，碑文请谁来写呢？村人自然想到了淄川的“蒲留仙”。

于是，村人公推苏成、梁坤、鞠良友为代表，牵着毛驴去请蒲松龄。此时蒲松龄已60岁，正在淄川西铺村毕际有家任私塾先生。毕际有是明朝天启年间的户部尚书毕自严之子，自己也是进士，任过知府知州一级的官，后因事受牵连，罢官回乡，他与蒲松龄既是文友，又是挚友。西铺村与长申地村不足10公里。据村民流传下来的记忆，聘礼是核桃、栗子、大枣三样本村山货和两袋精心脱碾的小米。蒲松龄为“山民”们的诚朴所感动，欣然应允上驴，跟随三人来到了长申地。于是，在一代文豪的笔下，有了这篇《创修五圣祠》的碑记：

长申地，章丘东南山村也。环村皆山，气秀而野。四顾层翠叠峦，如列屏嶂。地虽隶章。因近淄，淄之豹岩、龙丹诸山，螺髻烟鬟，近在几榻。村中数十家，率朴实，有古道。结庐人境，而无车马之喧，则鸡犬桑麻，何此异桃园村巷哉！凡村皆有神祠，以寄歌哭。村以小，故独无，居人忧憾之。比年稍丰，共发愚忱，捐金庀材，创为五圣祠。庶几春秋祈报，可托如在之诚。浆水呼名，亦有招魂之地。祠虽近俚，而固无害于义也。乡人之诚朴，亦从可知也。初冬落成，使余记之。余亦从俗，而为之记。康熙三十八年岁次己卯阳月中浣，淄川蒲松龄沐手拜撰。

文中提及的古道，是指章丘南部山区通往淄川、青州之路，但祠中所供奉的究竟是哪五位神圣，碑记没有记载。笔者曾在章丘多个村庄进行过调查。在清朝康熙、乾隆年代，由于社会相对比较稳定，百姓生活也较安定，各村建庙较多。所谓“圣庙”，又多以“圣祠”“圣堂”而名之。有三圣、五圣、七圣、九圣、十一圣不等。参阅邻庄石匣村在康熙五年《重修观音九圣堂》碑记载：“山神一尊、牛王一尊、增福一尊、二郎一尊、观音菩萨一尊、关爷一尊、平福一尊、马王一尊、土地一尊”，应是这些神圣中的五位。不同的是，长申地的五圣祠还有一个“浆水呼名”，是“招魂之地”，这在其他村庄是很少见的。

1962年，蒲松龄撰写的石碑，在五圣祠遗址残壁砖石堆里重新被发现，村民报告了当地政府，目前被章丘县文化馆、博物馆珍存。石碑青色石材，高2米，宽0.72米，厚0.18米，是蒲松龄先生在济南地区留存的唯一碑刻实物，也是蒲松龄的又一宝贵文化遗产，石碑的发现，也唤醒了村民们的乡愁记忆。如今，笔者站在石碑遗址的地方，“四顾层翠叠峦”，望着宛若“螺髻烟鬟”的豹山，还有那条古道，想象着蒲松龄先生骑着毛驴行走在“气秀而野”的这片土地上的画图……

投稿邮箱：

qlwbrwq@163.com